合众为一：公开同性恋从军和美军内文化冲突

E Pluribus Unum: Open 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e War within the US Armed Forces [1]

L·迈克·埃斯佩，哲学博士 / 法学博士，美国空军部（L. Michael Allsep, Ph.D., J.D., DAF）
詹姆斯·E·帕克，哲学博士，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James E. Parco, Ph.D., USAF）
大卫·A·莱维，哲学博士，美国空军部（David A. Levy, Ph.D., DAF）

作者特别声明：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国防部或空军部的官方立场。

1993 年 7 月 19 日，克林顿总统访问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麦克奈尔堡陆军基地，宣布了政府对同性恋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的新政策。总统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允许军中同性恋公开性取向，却未料到国会领导人不为所动，坚定要把同性恋排除在军队之外。无奈之下，总统在其“麦克奈尔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后来所称的“不问不说”（DADT）政策。[2] 这项新政策规定，军人如发生同性恋性行为或表现出同性恋性行为的明显意图，将被开除出伍；但同性恋者可在无公开证据的情况下服役。几个月后，克林顿提出的一个方案获国会高票通过（301 赞成票对 134 反对票），遂成法律。[3]

投赞成票者认为：军旅生活全然不同于民间生活，军人肩负特别责任，部队凝聚力至关重要，故而军队必须自成一体，即使这意味着其内包含某种歧视。[4] 部队打仗取胜不仅依靠军人的凝聚力，还要求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而公开同性恋性取向的军人据称有损于这些军风军纪。[5] 投反对票者认为：一个人的性取向与其工作表现没有关联，因此这项排他性政策对一支全志愿部队造成不必要的兵源损失。反对者进一步指出：所谓公开同性恋性取向的军人有损于部队凝聚力、士气或作战效率的指称毫无证据支持。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在辩论无果的情况下，“不问不说”政策于 1994 年 2 月成法生效。在其后 17 年中，同性恋者必须愿意掩饰其性取向，方可留在美军中服役。

有关同性恋从军之争，既非美国起始，亦非美国独有。在 1990 年代早期，西方许多国家就已面对这个棘手问题，困惑于同性恋军人的角色，争论结果各不相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 1992 年废除了禁止同性恋者从军的政策，以色利在 1993 年跟进。美国继续禁止公开同性恋者留伍，但非独例。英国也继续实施此禁令，直到 2000 年英军输掉一系列有关官司，同性恋从军禁令方始解除。此后，约 25 个国家允许公开同性恋者服役和留伍，其中包括欧盟全部现成员国和申请成员国，仅土耳其例外。[6] 这些国家在解除禁令的时候，都曾担心取消性取向歧视政策的做法可能败坏军人风气和部队效率等关键因素。然而担心的现象并未发生，各种预警最后都成杞人忧天之谈。可是美国继续坚持既定立场，又是十年。

反对派在国会数次挑战这项法律，一直无果。故而当众议院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 250 票对 175 票通过了废除这项有 17 年历史的禁止同性恋从军法律的议案时，竟让大多数人措手不及。三天以后在参议院，议案再次以 65-31 票决通过。接着在 12 月 22

日，经奥巴马总统签署，《废除“不问不说”议案》在 2010 年成为法律。[7] 新法虽然为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留出时间，规定必须在他们确定军队已做好了贯彻新法准备后 60 天才开始生效，毕竟终于清除了法律障碍，可为所有现役军人提供平等保护，不受性取向影响。

在美国军队历史上，象这种把原先遭禁群体纳入部队的里程碑式大变革并非首次。杜鲁门总统在 1948 年签字笔一划，就把黑人接纳入伍；[8] 国会在 1976 年决定美军军事院校必须向女生开放。[9] 继这样的种族和性别融合事件之后，军队将再次降低门槛，吸收同性恋入伍；这项要求军队扩大包容范围、为先前受歧视社会群体提供平等社会地位的新法律，定然再次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美国的担心不无理由。首先，接纳黑人和女性入伍并非一帆风顺且至今尚未完全形成共识。在今天的美军中，种族环境相对比较健康，但接纳女性入伍的观念仍有待深化。其次，在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上，军官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并在那种认为军队文化不仅有异于大众文化更较其优越的观念驱动下越走越远，令人惊觉。最后，宗教信仰足致虔诚信徒舍身取义，当宗教信仰同有关性取向的新法及新政策发生冲突时，信徒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更如鸿沟，尤难克服。本文探讨美军向着接纳公开同性恋者从军的过渡中，这三项挑战的潜在冲击。

接纳女性的问题

纵观历史，男性长久主宰着社会的军队阶层，几乎把女性完全拒之门外。[10] 但这种现象随着战争的技术性质发生变化而改观。澳大利亚著名社会学家康乃尔女士（R. W. Connell）指出：“暴力开始结合理性、结合行政组织技能和不断改进的武器及兵力投送先进技术。”[11] 用军事学语言来说，这就是美国已故作家密理斯（Walter Millis）所称的战争“组织革命”。[12] 用性别学语言来说，这表明男性霸权出现分裂，男权至上受到择能论的挑战，主宰行为不得不让位给唯贤是用，但择能论与传统的男性霸权观念格格不入，并且女性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占先。民族主义的形成锐化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亦为女性在国民阶层留出发挥空间。[13] 但在军队中，这份空间处于两种男性霸权版本争斗的夹缝中。其结果，赞同显性优势、排除女性、且受择能论挑战的那一派最终继承了民族主义衣钵。从这些文化冲突中产生出一种男权主义，可准确定义为“军事男权主义”。

越战结束以后，有人认为一场反对传统军事文化的战争正在展开，在这场战争中，“重新排列性别角色”的思潮可能最终摧毁男权主义和国家安全——而此两者正是构成军事男权主义的核心因素。[14] 美军越战失败后，美国军人形象蒙羞，军官阶层普遍陷入一种沮丧和背叛感。[15] 与此同时，起始于 1960 年代的女性觉醒风潮再掀波涛，草根女权活动如火如荼，到七十年代蔚然大观，成为华盛顿的一股强大力量，并终于打破历史壁垒，争得同等机会权，以至有人把七十年代称为“她的十年”。这场政治运动的核心，是推动对美国修宪，为所有女性争取在法律面前男女明确平等，结果诞生了“平等权利修正案”。就是在此背景下，国会开始关注允许女性入军校的问题。这项努力反映出：当社会政策的变化直接挑战军事男权时，尤其当军人一直把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等视为男性圣地时，美军文化于是面对困境，拙于调整自己。

军队中有关女性和男性平等从军的辩论，暴露出两个文化派别的根本冲突，一派坚决反对在平等基础上允许女性从军，另一派愿意至少立足客观标准接纳女性入伍。以军事男权为依据的一派已从军队历史和传统中获得所需的所有论证，从不顾及这些历史原本就视妇女为二等公民并剥夺她们展现同等价值的机会。男性军人及其支持者们凡把男权理解为一种上苍所赐且由历史经验和宗教教条背书的性别现实，就必然尊崇天然的（或倒错的）性别秩序基础上的传统。另一派人相信，个别女性如有机会或可证明自己同样胜任工作，但反对给女性特殊待遇或特别通道。这派人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实际上是视性别为一种社会产物，他们坚持的依然是男权主义，但置才能于显性优势之上，以亲眼所见而非传统所示或前人所信为参照标准。

尽管军队中两种观点尖锐对立，在 1975 年 10 月，福特总统签署第 94-106 号公共法案，其中一项条款规定美国军事院校平等对待女性。军方迅速贯彻法律，在 1980 年，所有军校的 80 级新生都包括了女学员，堪称史无前例。女军校生获得授衔后，顿成媒体热点，那些认为女性入伍将摧毁军事男权的说法退居角落，记者们普遍欢呼这批女性不畏艰难，勇气可嘉。生理性别无疑从第一天起就是个问题，但是更深层的观念性别问题一直潜隐不发。对那些反对军中男女平等的人而言，这种潜隐其实是另一个更大问题的病灶，这个更大的问题由危险的文化思潮和不断膨胀的民权革命所引发。有些人认为，就是因为那些多管闲事的政治活动家，才使得文化冲击不再游移于军队高墙之外，而在军事文化内掀起波澜。一如后来成为参议员的某退役海军陆战队军官当时所言：“文官对军队实施政治领导是一条好原则，”但是军队已经成为“政治家的玩具”，政治家扛着男女平等的旗帜，把军队当为“社会实验的试管。”[16]

文化分离问题

文官领导军队的概念一直管辖着美国的文职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并允许民间社会与军队社会有一定程度的隔离，但这种间隔自越战以来逐步扩大。[17] 军队通过授勋颁奖俨然产生一个特殊群体，为美国未穿军服的公民社会所难企及。对这种特殊身份的认可来自于美国民众对军人所体现的牺牲精神的真诚感激和赞赏。但同时在军队中，军人对自己的文化培养出强烈的优越感，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接受这种假设的优越。保守派活动家艾兰·唐奈利（Elaine Donnelly）最近提出：同性恋穿军装是对军事文化的一种威胁，她认为军事文化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该怎么做就应怎么做。”[18] 和大多数反对废除 DADT 的人士一样，唐奈利同意军队文化自成一体并代表美国最优秀者，故而军队应被允许在性取向问题上采取歧视政策，是为保存这所谓的道德优越性。持此观点者当不止她一人。为获得支持，这位女士征集了 1,167 名退役将官签名，这些将官也是给总统和国会成员上书的呼吁信签名者，在此呼吁信中，他们敦促国家领导人支持 1993 年的同性恋从军禁令并反对废除此法的任何企图。[19]

当唐奈利把军队文化定义成“该怎么做就应怎么做”时，她的本意其实就是“过去怎么做的还怎么做。”就像对待黑人问题和女权问题一样，美国的祖辈们使用过不同的政治语言，形成不同的形象和意象，但每一代人都面对着同样困惑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美国人——能全盘继承美国公民衣钵

的美国人。剥夺公开同性恋公民从军的权利，不仅使他们失去随着参军而应获得的特权和机会，还把他们列入因道德不达标而不能获得公民的全部权利与特权的一类。并且，那种希望继续把同性恋者排除在完整公民身份之外的军队文化，是由军队的阶层体制所主导，却与美国主流文化日渐疏远。国防部曾就 DADT 废除后的可能影响开展研究，调查结果不仅证明了一些学者早就认定的价值观差异，即军队领导人与美国主流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更进一步显示军队内部存在着代沟。[20]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中，反对废除 DADT 的思潮已经从关心社会团结和部队效能转向对同性恋的隐性歧视。在关注军队效能的外表下，涌动的是对其所假设的军人专属权利的担忧，是想保护军队的文化不受其所认为有害的外部骚扰。从此点来看，围绕 DADT 的辩论也映照出军队曾经发生、并继续在某些角落发生的对女性平等入伍权的辩论。最近有关废除 DADT 的争论，其实就是把究竟怎样才算是美国人的长期隐性斗争暴露在强光之下。这场斗争从殖民地时代以来就已存在，一方认为美国人是不同凡响的特殊民族，另一方认为只要接受公民信念和义务就是完整美国人。这场斗争至今余音时闻，比如所谓的“出生地查证运动”（Birther Movement），追随者无视所有证据，坚持认为奥巴马总统不是真正的美国人。[21] 更令人不安的余音还萦绕在国家最高军阶指挥官的指挥所里。

陆军军官出身的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安德鲁·巴斯维奇（Andrew Bacevich）最近呼吁关注“蔑视文化”在职业军官阶层中繁衍的危险，他们蔑视的对象是那些不穿军装的人，尤其是那些领导他们的文官。[22] 这种预警不无道理，特别是在《滚石》杂志暴露了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上将及其幕僚对文职领导人习以为常的不恭言辞之后。[23] 巴斯维奇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的“军人专制思潮，即武士们沉湎于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对自己有责任保卫的那些人的频频失误失去了耐心。”他接着说：

> “当麦克里斯特尔与其幕僚自以为是地鄙视国家高层文官时，当这批军官自诩为‘美国精英军团’，坚信自己正在英勇地抗击汹涌而来的愚蠢和腐败时，我们看到这种恶疾正侵蚀着美国的整个军官阶层。”[24]

开国元勋们对美国人的文化定义受到大多数社会保守派的认定，此定义虽模糊却一直保持强大影响，但现在与国家教义的法律至上观念发生冲突，此观念伴随多元文化主义发展，受到大多数社会进步派的推崇。军队不可能隔墙而治，它与其所服务的国家一样，无法逃离这些辩论的冲击，无法回避与之伴生的人口结构及文化的转变。文化转变是缓慢的，但是扎根于优越感的态度，连同对优越文化可能灭绝的恐惧，转变更慢。两者都不可避免，两者都不轻松，然而却构成美国自始以来的多元化现实。

多元化发展是发育到美国社会肌体中的习性。自从种族多元化在十九世纪中成为趋势以来，美国人口中的种族向多元发展在过去三十年中有增无减。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多元化指数”——测量从美国人口中随机抽样的两个人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种族背景的几率——显示了自 1980 年以来的明显趋势：[25]

1980：34%　　1990：40%
2000：47%　　2010：52%

当前的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群体占明显多数，但许多人依然保留着排斥外族的态度，然而美国义无反顾地继续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虽然公布的数据只反映出种族人口的变化，但我们可以从种族融合的许多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谨慎应对未来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历史经验清楚表明：维持文化现状不是可取之策；历史经验发出的信息明确无误：文化转变不可避免，任何机构都挡其不住。

对道德的质疑

美国南方腹地在内战结束后，曾经害怕种族融合会威胁到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这种恐惧和现在某些异性恋军人对同性恋融入军队的恐惧并无很大差别。正如黑人在民权法保护下的融合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合，并惠及女性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现在许多人把公开同性恋融入军队视为一个清晰而现实的危险，唯恐这种融合会引发更大的危机感,即担忧社会认可同性婚姻之后会引发“道德沦丧”，并进一步腐蚀植根于宗教信仰的家庭价值。

但人们在辩论“军中同性恋”问题时，辩论双方都闪烁其词。[26] 反对同性恋融入军队者列举了各种理由:军队战备、部队凝聚力、后勤保障、医疗救护、未来成本，等等。理由列了一大堆，却没有把最主要的理由说出口，这就是许多人心里认为同性恋不道德。他们的逻辑推论其实一目了然：

(1) 性行为属各人自择
(2) 不当性行为是不道德行为
(3) 择不道德行为者乃不道德之人
(4) 不道德之人不适合当兵

所有人都必然赞同禁止不道德之人入伍，从来没有人争辩说盗贼、杀人犯、强奸犯或恋童癖有权当兵，做出这样的歧视性判断没有困难，因为道德界线可以就地画出。但是在辩论同性恋的道德问题时，对话就变得分外谨慎和微妙。在确定何为道德或不道德的性行为时，便出现难解的分歧。视同性恋为不道德者必定积极赞同把同性恋排除在武装部队之外，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彼得·佩斯上将在 2007 年 3 月 12 日向媒体谈到军中同性恋问题时，试图设定不允许的性行为的界线，他的原话是：

> “据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我相信有些事情、有些类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我相信一名军人勾引另一名军人的妻子上床是不道德的……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发生同性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不可姑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我们知道了不道德的行为，无论行为者是谁，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如果我们的政策容忍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仅是涉及到同性恋行为，我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就不可能建设好。用这个观点来判断，那种认为公开性取向的同性恋者应被允许在军中服役的观点，在我看来，就如同我们从政策上姑息我所认为的不道德行为。”[27]

佩斯将军的言论立刻招致猛烈的抨击。三个月后，国防部长宣布他将向总统建议不提名佩斯将军连任参联会主席。[28] 佩斯遂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下台。

对佩斯将军这番言论的激烈反应，让所有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人警醒——管好自己的嘴巴，切勿随意表述个人观点。国防部长盖茨在几天之后谈及佩斯将军的言论时表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看法毫无立足之

地。我们有法律，有管辖‘不问不说’的法规，这就是国防部的政策，我的责任就是有效贯彻这项政策，法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大学教授及同性恋维权活动家安伦·贝尔京（Aaron Belkin）后来评论说：“佩斯将军敢于把大家心知肚明的观点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我深表赞赏。”这位前参联会主席反对同性恋从军的观点，其实为许多军官所认同，但是眼见佩斯将军的军旅生涯黯然了结，几乎所有人在讨论同性恋是否应该公开从军时，都对“道德”一词噤若寒蝉。[29]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道德行为的判断依据两个来源：法律条文和宗教教义。依法判断道德，分歧不会很大。美国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就是这样的权威依据，只要军法允许某种行为，那么就应该允许；反之则不允许。道德行为只能遵循法制并据法界定，无论个人感受如何。但是当我们立足宗教来判断道德时，就不易分辨是非曲直。美军是一支把自己定义为有 85% 的军人信基督教的军队，管辖军队的“宗教法”更加强辩好胜，并且不会随着国会的意愿而轻易改变。有关道德的法律基础经总统大笔一挥就能改变，有关道德的宗教基础则被信徒们视为亘古真理，不容置辩。美国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因为其导则条款规定：“国会不得立法规定尊崇某一宗教，亦不得立法禁止任何宗教自由表述。”[30] 以此为据，政府不能强迫民众违背其合法享有的宗教信仰行事，但军方也不可基于宗教教义来歧视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合的人。

当前的社会政策允许美国公民自主择群，包容谁或排斥谁纯属自愿。例如，一个人在选择敬奉神明的地点时，所选神堂应该不仅在神学认知上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致，而且在同性恋问题上与自己的个人信念契合。一个人如果认定同性恋是罪孽并为上帝所憎恶，他就应该选择一所与自己的排斥程度一样的教会。在过去十年中，有些教会失去了一些信徒，原因就是这些教会被认为“过分包容”，离走的信徒们是想寻求与那些排斥同性恋的教会群体为伍。只要看一看美国新教圣公会最近的分裂危机，就可以理解同性恋问题正在激起对其道德地位的质疑，甚至基督教内部也不例外。

对那些从字面上领会圣经经文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同性恋行为无疑是不道德的，圣经描述的形象已经清晰印在他们的心灵：“不可与男人苟合，象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31] 但是对于那些从喻义上领会圣经教诲的人而言，很难厘清运用道德原则来排斥同性恋从军的做法是否妥当。就像历史上曾经把蓄奴的做法视为符合道德但后来被普遍拒绝一样，以宗教为基础来判断同性恋之道德性的做法说得最客气是值得商榷，因为即使在美国基督教主流教派中，对这个问题也有分歧。

在废除 DADT 之前，美国陆军驻欧司令部司令卡特·汉姆（Carter Ham）上将及国防部法律总顾问杰哈·约翰逊（Jeh Johnson）联合领导了一项全面调研，并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向国防部长呈交了长达 267 页的调查报告。不出所料，这份报告指出，反对修改政策的力量明显基于宗教立场。特别是，军中 3,000 多名牧师表达了忧虑，担心无法通过布道告诫军人“同性恋是罪恶和耻行，上帝要求他们这样谴责。”[32]

汉姆和约翰逊在调查报告中谈到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担忧：“目前的现实是：美军组成中包含道德价值和宗教信仰尖锐对立的各

种人——有人相信堕胎是谋杀，也有人相反；有人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有人相反，还有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们每天在一起相处、工作、生活和战斗。另一个现实是：军中已有政策允许军人自行表达宗教信仰和自由参拜祷告。我们认为这些政策已经足够，我们不可要求军人改变其个人观点和宗教信仰，但要求军人必须和观点及信仰不同的其他人互相尊重和共处。”[33]

这份全面的调查报告为有效废除公开同性恋从军禁令列举了三个关键因素：领导态度、专业风范、互相尊重。并特别提出，在此三个因素中“领导态度尤其重要。”显然，军中牧师团的领导表现将至为关键。根据军队规定：“牧师要照料包括无信仰者在内的所有军人，尽力满足所有信仰者的个人宗教需要，提供不同信仰的宗教服务，并辅佐指挥官。”但是军中牧师还受美国宪法保护，拥有据其信仰教义开展布道的自由。有些牧师在布道中赞同包容、尊重和同情，也有些牧师赞同封闭和排他，此次政策修改对前者应能平稳接受，对后者则后果难测。军队规定所有军人，包括牧师及其信徒，在公开场合都必须尊重和容忍别人。但是一旦进入其礼拜殿堂之内，牧师就有自由宣讲其信仰教义，其中可能包含分裂和排他内容。如此双重做法，可能把此类教会变成受军队认可的军中自由发泄特区，军人可能前来发泄他们对某些政策的反对。这种情况虽然完全合法，但如果有些教会变成了发泄政治不满和抗议的集会中心，就可能在军队体制的高墙之内激化文化战争。

政策变化从不等同于文化转变，两者之发展既交织相关又互有分离。无论如何，转变不可避免，为防备不必要的潜在激化和动荡，各级领导必须引领下属度过社会所要求的新一轮社会融合。汉姆和约翰逊所提的“领导态度尤其重要”正是成败所在，政策修改所牵涉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容低估。贯彻新政策需要时间才能成功，但任何拖延都不会使那些反对新政策的群体获得更多的拥戴。

多元化的归宿

多元主义者的“合众为一”[34] 观已经植根于美国联邦体制中，其实质就是政治多元化。但文化多元化一直在美国社会中挣扎求存。兹引述美国社会活动家弗里德利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言论如下：

> “人类追求自由的整个历史进步表明……自由全靠斗争，没有诉求就无法迫使权力退让，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

军队辩论文化价值正常并且必要，分歧自在意料之中，最终必分输赢。社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防止文化转变和政策变化之间严重不谐。总之，历史教育我们，当我们的国家站在两岔口时，必得二择其一，要么择难途而进，要么择易途而止。

多元化的现实，就是无论做出哪种选择，我们最终都将达到同一个地点；对军队而言，区别仅在于抵达此地点需要承受多大程度的自伤。美国一直沿着多元化道路前行，美国的历史就是多元化不断增加的历史；朝多元化前行的每一步努力都碰到阻挠，但阻挠最终总是失败，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政治雄辩能够阻挡美国前行。的的确确，多元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敌手。♣

注释：

1. 本文是三位笔者过去发表的以下三篇英文论文的综合：

(1) Allsep, L.M. (2010), The Odyssey of James Webb: An Adaptive Gender Perspective, in Attitudes Aren't Free: Thinking Deeply About Diversity in the US Armed Forces [《信念争鸣：深思美军的多元化》论文集中“詹姆斯·韦伯的苦旅：论适变性别观”], Eds. James E. Parco and David A. Levy. Maxwell AFB: Air University Press,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5FnvJEclewC&lpg=PA320&vq=allsep&pg=PA299#.

(2) Allsep, L.M., Levy, D.A., and Parco, J.E. (2011), The Culture War Within: Reconciling policy change and military culture after DADT [军内文化战争：论后“不问不说”时代政治变化和军事文化之协调], Armed Forces Journal, January/February 2010. Accessible at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11/02/5363912/.

(3) Levy, D.A. and Parco, J.E. (2010), An elephant named Morality: The latent argument over 'Don't Ask, Dont Tell' [避之不及的道德主题：“不问不说”大辩论的隐性焦点], Armed Forces Journal, September 2010,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10/09/4679369/.

2. Cannon, C.M., Clinton issues gay policy, Military chiefs back directive [克林顿宣布同性恋政策，军方表示支持], The Baltimore Sun, 20 July 1993.

3. 参看美国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

4. 同上，(a)(8)(a)。

5. 同上，(a)(8)(a)。

6. Palm Center Report (June 2009), Nations Allowing Gays to Serve Openly [多国允许公开同性恋从军], http://www.palmcenter.org/research/nations%20allowing%20service%20by%20openly%20gay%20people.

7. CNN Staff Wire, Obama signs repeal of 'don't ask, don't tell' policy [奥巴马签署废除“不问不说”法案], 22 December 2010, http://articles.cnn.com/2010-12-22/politics/dadt.repeal_1_repeal-openly-gay-men-president-barack-obama?_s=PM:POLITICS.

8. Executive Order 9981 [第 9981 号总统令], http://www.trumanlibrary.org/9981.htm.

9. Mitchell, B.P. (1998), Women in the Military: Flirting With Disaster [军中女性：与灾难调情], Washington: Regnery. 32.

10. 参看注 1 中 Allsep, L.M 文。

1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男权主义],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92.

12. Walter Millis, Arms and Men: A Study in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武器与人：美国军事史研究],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沙滩和军营：论说国际政治的女性观],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990 and 2000), 61—62.

14. 可参看詹姆斯·韦伯的“女人不能打仗”(Women Can't Fight), Washingtonian, November 1979.

15. Michael S.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美国的大男子主义：一部文化史],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4 and 197.

16. James Webb,“Women Can't Fight”[女人不能打仗], Washingtonian, November 1979.

17. Peter D. Feaver and Richard H. Kohn, ed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 Civil-Military Gap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军人与平民：军民隔阂与美国国家安全],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18. Donnelly, E. (2010), Defending the culture of the military, in Attitudes Aren't Free: Thinking Deeply About Diversity in the US Armed Forces [《信念争鸣》论文集中“捍卫军队文化”], Eds. James E. Parco and David A. Levy. Maxwell AFB: Air University Press.

19. Center for Military Readiness (2010), Flag and General Officers for the Military, [《信念争鸣》论文集中“退役将官为军队请愿书”].

20. Generation Gap Divides Troops on Gays in Military [同性恋从军问题在军中代沟分明], The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1, 2010, http://www.usnews.com/news/articles/2010/11/01/generation-gap-divides-troops-on-gays-in-military.

21. 请访问“出生地查证运动”网站：http://www.birthers.org/.

22. Bacevich, Andrew, Endless war, a recipe for four-star arrogance [无尽的战争，四星傲慢的菜谱],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2010,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6/25/AR2010062502160.html.

23. Hastings, M. (2010), The Runaway General [管不住的将军], Rolling Stone Magazine. June 22, 2010,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24. 参看注释 22。

25. El Nassar, H. Minority births drive growth in U.S. diversity [少数族裔高生育率进一步推动美国多元化], USA Today, June 22, 2010, http://www.usatoday.com/news/nation/census/2010-06-10-census-minorities_N.htm.

26. 参看注释 3。

27. “Pace clarifies gay comment as his 'personal moral views'”[佩斯将军澄清其有关同性恋言论为“个人道德观点”], The Washington Times. March 14, 2007,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7/mar/14/20070314-121537-6699r/.

28. Frank, J.“General Pace out as Joint Chiefs Chairman”[佩斯将军卸任参联会主席], Chicago Tribune, June 8, 2007, 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07/mar/14/20070314-121537-6699r/.

29. 与 Belkin, A. 的访谈 , May 26, 2010. Maxwell Air Force Base, Montgomery, Alabama.

30.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31.《圣经・利未记》18:22。

32. Ham, C. and Johnson, J. (2010), Report of the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Issues Associated with Repeal of 'Don't Ask, Don't Tell' [有关废除“不问不说”政策相关问题的全面审查报告], Delivered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Nov 30, 2010, 12, www.defense.gov/.../DADTReport_FINAL_20101130(secure-hires).pdf.

33. 同上，第 12 页。

34.“E pluribus unum”是拉丁文，意为“合众为一”（out of many, one），见于美国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门过去所有主要印鉴，此印鉴文一直是美国人事实上的国训。直到 1956 年，国会正式改用新国训“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

迈克尔・奥赛普博士（L. Michael Allsep），空军大学助理教授，在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领导艺术与战略系讲授比较军事学。他从北卡罗来纳大学察佩希尔分校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并曾担任杜克大学历史系客座助理教授。他持有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并曾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担任执业律师。

詹姆斯・帕科中校（Lt Col James E. Parco），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领导艺术与战略系教授。他持有威廉玛丽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及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学位。此前他曾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并以外交官身份供职于美国驻以色利大使馆。他在心理学与经济学领域著述甚丰，对人类决策行为的博弈理论模型有精深研究。

大卫・利维博士（David A. Levy），美国空军军官学院管理学教授 ，持有康奈尔大学组织行为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空军服现役 10 年，后担任 KPMG 公司与 Grant Thornton 公司的组织转型顾问。他经常应多方邀请就适变型领导艺术发表演讲。

免责声明

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